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深層課題

• 朱雲漢

社會科學存在「本土化」的課題是基於兩個前提：第一、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特定性；第二、知識社群與社會的關係沒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更沒有定於一尊的最佳模式。我們要問：以歐美歷史經驗為背景所建構的社會科學概念與理論，用於分析與理解我們自己所關注的社會現象時，是否有效？

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議題在兩岸三地的知識界並不是新鮮課題。在台灣，有關於本土化的討論至少已經持續進行了二十年，近幾年大陸知識界也展開頗為熱鬧的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討論^①，並激發了一些對本土化主張的反省與檢討^②。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相當透徹，或是已經充分開展這個課題所涉及的核心議題。尤其隨着社會科學哲學理論以及知識社會學觀點的不斷演進，這個課題仍有廣大的討論空間，也有許多有待深掘的議題層次。

社會科學存在「本土化」(indigenization)的課題^③，是基於兩個前提：第一、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歷史)特定性；第二、知識社群與社會的關係(透過制度安排與專業倫理來體現)沒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更沒有定於一尊的最佳模式。如果社會科學知識是普遍超越時空的，而且所有的社會科學家所處的結構位置以及所追求的實踐目的均相同，社會科學就不存在本土化的問題。如果我們接受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特定性的前提，以及在不同的歷史傳承以及發展階段的差異

下，不同社會可能根據不同的理念來建構知識社群與社會的關係，來設定知識的實踐目標，我們就無法迴避「本土化」的課題。從時空特定性的前提出發，我們要問：以歐美歷史經驗為背景所建構的社會科學概念與理論，用於分析與理解我們自己所關注的社會現象(特別是本土社會或是與自己有文化親近性的社會現象)，是否有效？是否貼切？會不會出現曹錦清所說的，以「譯語」角度來考察中國社會，往往無所指而強為之指、削足適履、指鹿為馬^④？從實踐目標差異的前提出發，我們要問：即使對於同樣範疇的社會現象，研究者基於不同的社會位置與實踐目的，是否會產生不同的知識需求，選擇不同的研究方法，採取不同的理論解釋觀點，因此建構出相當不同的知識體系？

對於這兩個問題，在進入華人世界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正題之前，我們應該先從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主張，以及歐美社會科學界的實例切入，才能正本清源。首先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特定性，幾乎是所有屬於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t) 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學派的共識^⑥，尤其被稱為「新社會科學哲學」的「科學實存論」(scientific realism) 對此本體論層次主張，所建構的論述最為完整^⑦。限於篇幅，筆者在此無法詳述，但我們可以將科學實存論的主要論點扼要歸納如下：第一、社會結構與制度的存續有時空限制，不可能像自然世界的機制具有萬古長存的本質；第二、社會結構與制度與行動者的主觀意識具有相互構成的 (mutually constitutive) 關係，前者無法擺脫後者而獨立主宰社會行動，因此社會結構與制度必然是鑲嵌在特定的文化脈絡之中；第三、一個社會的結構與制度的演變具有路徑依循 (path-dependent) 的性質，因此很少有兩個社會會依循相同的歷史發展軌迹；第四、社會科學的知識建構與傳播本身就具有轉化社會結構、轉化行動者主觀意識的潛在作用，此一特性使得社會結構與制度的長存永續，成為不可能^⑧。

對於第二個命題，我們可以將晚近西方學界有關學術社群結構位置、知識建構活動、與理論實踐目標之間關係的討論，簡單歸納如下：第一、一個社會科學社群的知識建構活動，深受其所特有的社會結構關係以及意識形態傳承的影響，這些條件塑造了社會科學家的自我定位、社會分工角色、以及與其他社會部門的資源依賴與交換關係；同時也深刻影響一個學術社群內部的組成方式、專業規範、思維方式以及學術風格^⑨；第二、不同的社會角色與自我定位會孕育出不同的實踐目標，而不同的實踐目的會激發不同的知識需求，進而影響到一個社會科學社群對於甚麼是有價值的知識形式與合理的解釋模式的判準，

也就是影響到一個人(或整個學術社群)所採取的方法論立場。簡單來說：實證主義方法論引導學者追求工具性法則形式的知識，因此最能滿足社會預測與控制的目的(當然也最具有市場的交換價值)；實存論與批判主義的方法論引導我們揭露社會秩序的本質，以及探討可能替代現狀的較佳社會秩序，因此最能回應解放思想與轉化社會的實踐目的(但對於既得利益階層有一定的威脅性)；後現代的論述否定理性辯論與說服的可能性，對於一切知識主張採取相對主義的立場，因此可以達到顛覆既有知識與權力結構的目的；詮釋學派重視進入研究對象的主觀意義體系來理解社會行動，因此最能達到社會溝通的功能^⑩。總之，根據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在西方的社會科學哲學與知識社會學的相關論述裏，為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找到理論基礎。

其次，我們可以舉美國與歐陸這兩個政治科學學術社群的互動經驗作為例證。以美國與歐陸社會的文化親近性與發展接近程度而言，把美國政治學的經驗性民主理論用於解釋歐陸民主體制運作經驗，應該具有高度的相互參照價值，但事實並非如此。戰後美國政治科學的最突出的經驗性民主理論，可以達爾 (Robert Dahl) 與林德布羅姆 (Charles Lindblom) 所建構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 模式為代表。但是許多歐洲背景的政治學者則認為，多元主義的模式無法用來解釋許多歐陸國家的利益團體影響參與政策制訂的現象，或是整體的國家社會互動關係，因而提出統合主義模式 (corporatism) ^⑪。不僅如此，歐陸政治學者對於戰後政治科學的美國化 (Americanization) 傾向及其意涵，始

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時空特定性，幾乎是所有屬於後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學派的共識。後現代的論述否定理性辯論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達到顛覆既有知識與權力結構的目的；詮釋學派重視社會行動，因此最能達到社會溝通的功能。

歐陸政治學者對於戰後政治科學的美國化傾向及其意涵，始終抱持高度的警覺。因為歐陸學者意識到美國的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在選擇研究議題與運用理論觀點時，往往不自覺地反映出美國在全球體系裏所處的結構性位置，也就是不自覺地在維護或合理化美國的霸權。

終抱持高度的警覺，這種維護學術發展自主性的自覺，在國際關係領域特別突出^①，因為歐陸學者意識到美國的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在選擇研究議題與運用理論觀點時，往往不自覺地反映出美國在全球體系裏所處的結構性位置，也就是不自覺地在維護或合理化美國的霸權地位。歐洲國際關係學者追求學術觀點自主性的努力，最具體表現在開辦以歐陸學者為主要對話對象的學術期刊，例如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Millenniu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等。在解釋觀點上的分歧，可舉美國主流派學者（以新現實主義學派為代表）與許多歐陸學者（以建構主義學派為代表）對於二十世紀後半最重要的結構性變遷——冷戰體系的崩解與東西對抗的結束——的理解上的差異，作為例證。美國學者強調美國憑藉其經濟與科技力量，在兩極體系內透過軍備競賽與代理戰爭拖垮了蘇聯帝國，讓蘇聯不得不放棄兩極對抗；歐陸學者則強調東西對抗結構的解體過程之所以如此和平，主要是因為自70年代以來在西歐與蘇聯決策菁英之間建立了有效的安全對話機制，由於這些信心建立機制的長期運作，乃從根本處轉化了蘇聯最高決策者對於自身所處的安全情境認知，以及激發了對於自身安全需求與歐洲安全秩序的不同設想^②。歐陸的國際關係社群之所以會發展有別於美國主流的理论觀點，以及不同的學術傳統，不僅是因為歐洲國家在全球體系內所處的地位不同，也是源於歐洲學術社群承襲不同的文化脈絡，以及鑲嵌在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結構之中，對於甚麼是一種合理與正當的國際秩序，有不同的價值判斷，不同的想像；同時，一般而言，

歐陸的社會科學社群與國家機構與資本家的資源依賴關係比較鬆散，因此表現出較高的學術觀點多元性^③，也因此批判性觀點在歐陸的學術社群也有較大的生存空間。

討論完歐洲的經驗，我們可以開始進入正題。「社會科學本土化」基本上有雙重意涵：第一層的意涵在於，不同的學術社群所關切的或所熟悉的歷史經驗不同，因此有建構不同分析概念與理論的需要；第二層的意涵在於，不同學術社群所處的結構位置不同，所標榜的實踐目的不同，所以自然會發展不同取向的知識體系。對於華人社會政治科學本土化的目標而言，第二層的意涵要比第一層更為關鍵、更為根本，因為歐美學者也研究開發中國家，也研究中國社會，也研究台灣與香港；歐美的中國研究也有其獨特的學術傳統與專業，與西方社會科學主流之間一直有隔閡，在方法與理論上也時有爭論。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歐美學者對於中文以及與中國人主觀意識的掌握，也未必不如文化根基淺薄的中國學者，而且西方學者所具備的跨文化背景，更可能激發一些特殊的觀點與洞見。但是，中國社會科學家作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成員，本土學術社群作為自己社會的一個構成部分，自然會產生有別於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主體認同、社會角色定位、知識實踐目的，以及終極關懷。

以美國的中國研究而論，雖然這個學術社群並沒有標榜全體一致的實踐目標，但確實存在一些符合主流價值的顯性或隱性的實踐理念。其中包括：協助美國社會各部門的決策者，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的發展趨勢有更好的掌握與預測，以制訂更有效的對華戰略與政策；更有效地引導中國社



會按照西方的價值標準進行演變；或藉着對於中國社會現狀的評價來反證自己的價值體系與政治制度的優越性等。這些知識實踐的目標對於多數中國學者而言是難以認同的，至少無法激起任何熱情。對於本土社會抱持人文關懷的中國學者所認同的實踐目標可能是：如何讓自己的知識建構活動與中國社會內部的公共論述產生更緊密、更有意義的連結；如何幫助中國人克服現代化過程中面對的各種挑戰與困境；如何幫助中國人維護自身文化與社會發展的自主性，以及如何根據自己社會的歷史條件從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汲取經驗與記取教訓；如何設法改變既存的國際秩序對於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設定的各種不合理的結構性限制與障礙。這些實踐目標對於外來的研究者而言，反而是格格不入的，也很難想像在歐美任何有成就的中國問題專家敢觸犯主流價值，來主張這些實踐目標。

由於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不存在主體認同上的聯繫，絕大多數歐美中國研究學者可以輕鬆地自外於他的研

究對象，與他研究的客體（中國社會）維持一種超然（detachment）與隔離（insulation）的關係。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實踐層次對於中國人所可能帶來的幫助（或傷害），不是自己最根本的關懷所在；中國社會的各種變化（無論往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對於自己的生存意義與自我尊嚴，不會構成嚴重的衝擊。歐美學者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夠在歐美學術社群裏得到肯定、在自己的社會的公共論述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主流意見的形成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因此會自覺或不自覺的與歐美社會的主流價值（乃至於成見）相互呼應。這種相互呼應現象往往是很自然出現的，不是刻意的「迎合」的結果，因為這些主流價值，已經內化為研究者個人信念體系的一部分。

許多歐美的中國問題專家，很自然地會以西方歷史經驗所孕育的世界觀作為分析的起點，作為問題意識的起點。在歐美主流價值體系中，個人的自利動機與自由意志具有絕對的正當性，而且被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以個人自主、自我管理與自我

由於與研究對象之間不存在主體認同上的聯繫，絕大多數歐美中國研究學者可以與他研究的客體（中國社會）維持一種超然與隔離的關係。他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不能在歐美學術社群裏得到肯定，因此會自覺或不自覺的與歐美社會的主流價值相互呼應。

歐美中國研究學者最常用的就是功利主義的模型，將所有政治人物簡化為「權力極大化的追求者」。在這種假設下，鄧小平、馬可斯與蘇卡諾的政治行動邏輯沒有根本差別，最多只有高明與不高明之分。這些帶有歷史目的論色彩的研究假設，是否能有效幫助我們掌握中國社會現象的本質，頗令人懷疑。

負責的原則作為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幾乎被視為一種「自然秩序」；由代議民主、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構成的「三位一體」結構被視為人類社會現代化的必然終點，也是評估所有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進步與落後的準繩。所以歐美中國研究學者最普遍接受的假設就是：所有社會發展的進步必然是由於引進尊重個人自利動機與自由意志的「新」機制，任何社會發展的瓶頸都必然是根源於抑制個人自利動機與自由意志的「舊」體制；最常提出的問題就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是否會帶來民主化，是否會促進市民社會的形成；在分析中國社會政治菁英的行動邏輯時，最常用的就是功利主義的模型，將所有政治人物簡化為「權力極大化的追求者」，在這種假設下，鄧小平、馬可斯 (Ferdinand E. Marcos) 與蘇卡諾 (Achmad Sukarno) 的政治行動邏輯沒有根本差別，最多只有高明與不高明之分。這些帶有歷史目的論色彩的世界觀，以及忽視歷史特定性 (ahistorical) 的研究假設，是否能有效幫助我們掌握中國社會現象的本質，全面與忠實地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理清中國社會重要發展脈絡之間的關係，務實地幫助中國人解決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各種問題，這是頗令人懷疑的，但對多數歐美學者而言，這些嚴肅的課題可能都不如自己的學術升遷、著作銷路和媒體曝光機會來得重要，而這些有形的激勵，都與自己的分析架構與解釋模式，是否能與社會科學的主流典範與社會的主流價值相互呼應，密切關聯。

社會科學本土化議題最重要的啟示，就是提醒來自中國社會與文化背景的學者，對於指導自己知識創造活動的每一項前提、每一項預設立場、

每一種思維方式、每一項學術準則都要進行嚴肅的檢視，建立自主性的思考。實現社會科學本土化有三項最基本的要求：**第一項基本要求是，學術社群的成員必須深化對本土社會的人文關懷**，而這本來就是中國知識份子人文傳統的精髓，正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研究者必須對於自己的知識建構工作的「社會意涵」(social relevance) 有自覺性的省思，認真對待自己知識活動所具有的促進社會溝通、達成社會控制目的、啟蒙社會大眾與改造社會結構的各種潛能。同時，學術工作者應該重視知識普及的工作，在知識的傳播、推廣與應用上投入更多心力，尤其應該對社會弱勢團體的知識需求同等重視，而不單以研究資源提供者為服務對象。以這個立場作為出發點，才能透徹地評斷自己的知識活動的意義何在，自己知識活動的實踐目的何在，自己的社會角色定位為何；也才能在一個穩固的立足點上，建立學術準則與學術風格。反之，如果缺乏這個層次的覺醒，學者很容易淪為知識生產與交換關係裏的一個參與者，知識淪為「商品」，而學術社群不自覺成為服務現有權力結構的工具^④。

本土化的**第二項要求是，學術工作者要建立主體性認知**。要意識到自己與本土社會存在一種必然性的關係，而非偶然性的關係，這是本土學者與外來研究者在社會屬性上的根本差異。從中國社會本位出發，我們必須重新檢視兩個影響知識建構活動的重要機制，一個是社會層次的，一個是思維層次的。首先，我們要問西方社會科學(或更狹隘的說美國的社會科學)所樹立的學術規範、專業倫理與學者的社會分工角色，是否真正符

合自己社會的需要，是否值得進行完整的移植；還是我們應該考量自己的文化傳承與社會條件，同時深入評估西方發展經驗的得失，做選擇性的借鏡。舉例而言，固然今日大陸、香港、台灣的大學制度均源於歐美，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的社會科學界在學術風格、師生倫理、學者社會參與角色以及學術社群與國家機構關係等每一個面向，都應該完全仿照西方學術界的成例。特別是美國的政治科學社群是否真的可以作為其他開發中國家的典範，是頗值得懷疑的。戰後美國政治科學所標榜的經驗研究傳統，堅持價值與事實的絕對二分，將自己的社會角色界定為教育具備知識的公民 (well-informed citizens)，政治學者成為政治現象的解盤者，其社會分工角色跟股市分析師相去不遠，並使得政治學者的研究普遍上缺乏批判性，無法發揮學術工作者原本可以提供的社會反省功能與社會改革角色，不自覺地扮演維護與合理化現存政治秩序的角色，所以絕大多數的美國政治學者是自外於美國社會的政治改革議題，在美國社會的公共論述與權力運作中佔據非常邊緣化的角色，這與美國政治學者在本世紀初期所展現的學術傳統大異其趣，不知道這是進步還是退步^⑮。晚近蔚為美國政治學主流的理性選擇學派，更將知識創造與社會實踐脫節的現象推到了極致^⑯。

其次，我們要嚴肅檢視本土的研究社群是用那些標準來評斷甚麼是有價值的研究課題，甚麼是可靠的研究方法，甚麼是有效的分析工具，甚麼是值得追求的知識形式。我們要問這些標準是從哪裏來的？這些標準真的是放諸四海皆準？這些標準背後的方法論立場為何？不同的方法論立場後

面隱含着那種意識形態與實踐目的取向？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問：作為本土社會的一員，基於不同的終極關懷與實踐需求，我們對於這些前設性的問題所採取的標準，是否應該與外來的研究者有所不同？我們要時刻反省，自己是否經常不自覺地運用以西方文化為本位的世界觀來界定議題與分析現象？我們要問：除了歐美社會科學主流典範的觀點，還有哪些分析問題的角度？在各種可能的觀點中，有沒有比較能反映中國人本位的觀點？

以上這些基於中國人主體認同所激發的問題，不僅可以用於檢討當前中國社會研究的學術路線，也可以適用於政治思想、比較政治、以及國際政治領域。例如，我們可以探究，究竟當前歐美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領域裏反覆探討的核心議題，是不是只有在其特殊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才能凸顯其意義？在中國社會的文化與歷史脈絡中，是不是有一些特有的政治正當性的概念與論述，而這些論述對於參與與引導中國社會內部的公共論述更有意義。我們也可以追問，美國國際關係學者所關注的議題與所運用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所獨享的霸權格局，在多大程度上是反映美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外交政策目標？

本土化的**第三個基本要求是，建立學術發展的自主性**。追求學術發展的獨立，首重掌握研究典範與研究議題開發上的自主性，而不以盲目追求國外學術時尚，或迎合歐美學界研究分工上的需要為導向；其次是逐漸發展完整的研究人才培育機制。如此才可能擺脫對於歐美學術界的結構性依賴，逐步建立自己的學術傳承與符合本土社會需要的學術路線；也惟有如此才能逐步調整與歐美學術界的不對

作為本土社會的一員，基於不同的終極關懷與實踐需求，我們要時刻反省，自己是否經常不自覺地運用以西方文化為本位的世界觀來界定議題與分析現象？除了歐美社會科學主流典範的觀點，還有哪些分析問題的角度？有沒有比較能反映中國人本位的觀點？

用今日新現實主義的研究典範，無法有效解釋中國朝廷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的行為。例如，明成祖數度派遣龐大艦隊七下西洋，既無開拓海上貿易的動機，也無掠奪領土或資源的野心，更無爭奪殖民的念頭。這種對外關係的策略，是無法用所謂「客觀的」國家間力量對比來推論的。

等交換關係，從單向的理論輸入與移植，進步到雙向的知識交流與平行的理論對話。但這並不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更不是少數學者可以獨立完成的，這需要幾代學術工作者的共同覺醒與努力。

對於華人政治學者而言，在自主性研究議題的開展上，可以說是海闊天空。因為四千多年來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奮鬥，以及中國人與境外民族交往的經驗，提供了極其豐碩的歷史題材，可以發掘很多具有理論開創意義的研究題材。這些歷史經驗的整理與解析對於建構中國人的世界觀，對於探索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對於豐富人類整體的歷史經驗，以及思考人類未來的世界秩序，也是不可或缺的。

事實上，今日西方的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所依據的歷史經驗是相當有限的。就以今日的國際關係理論而言，主要是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構成單元的國際體系，即所謂的西伐利亞體系 (Westphalian System)，這是在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之後，在西歐國家間建立一種新秩序，然後經由西歐國家的對外擴張與殖民活動所逐步發展出來的全球性國際體系。這個現代國際體系的組織原則與運作邏輯，對於當代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機會與限制，當然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但如果放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這段經驗卻有其明顯局限。在西方列強的勢力進入東亞之前，中國人已經與東亞地區的各民族在一種差序格局的世界秩序中相處了數千年。用今日新現實主義的研究典範，是無法有效解釋中國朝廷在這個世界秩序中的行為，也無從掌握中國統治者對於這個世界秩序的理解與自我定位。

例如，明成祖派鄭和組織龐大艦隊七次下西洋的政治目的，對於新現實主義的研究典範而言，就是一個難以消容的異例。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所展現的造船與航海技術，以及所彰顯的軍事投射能力，在當時絕對是獨步全球^⑩。但是明成祖數度派遣龐大艦隊遠赴印度洋與東非，既無開拓海上貿易的動機，也無掠奪領土或資源的野心，更從未有過爭奪殖民的念頭。明朝皇帝對於鄰近各部落與王國所採取的是「厚往而薄來」，鄭和七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是「宣德化而柔遠人」，所追求的境界是「遠募唐宋賓服四夷之盛」，所祈求的政治效果是「四夷來歸，萬邦來朝」。要理解這種對外關係的策略，必須放在中國的歷史與文化脈絡裏來分析，透過中國統治者的世界秩序觀，以及建構國內政治秩序所依據的正當性論述來理解，而無法用所謂「客觀的」國家間力量對比來推論中國與鄰邦間的互動模式。數千年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國際體系是無法簡單地用新現實主義框架下的單極體系或霸權穩定論來歸納，這段歷史經驗更凸顯了新現實主義典範下國際體系結構分析的歷史局限性。

自主性的研究議題開拓，並不僅限於研究中國歷史經驗或中國社會現象，而應該涵蓋有助於達成我們的社會實踐目的的所有現象與問題，否則學術發展的格局將十分有限。這些議題可能涵蓋建構合理社會秩序所涉及的最基本理念，例如個人與群體，公平與正義，自由與權利等；也可能包括對於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演進的探討，對於西方代議民主實踐經驗的回顧與反省，乃至於從第三世界國家與人民的角度對於現存國際體系的組織原則與運作邏輯進行反省與批判。

這些知識創造活動的範疇與西方社會科學關注的議題的可能是高度重疊的，但只要是出發點不完全相同，參照的基準點不盡相同，就有可能提出新的見解與理論創造，這種例證俯拾即是。例如，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對於美國民主政治特質的詮釋，就有其獨到之處，到今天都還是一本有關美國民主最重要的經典之作。

在提倡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同時，我們要時時自我警惕，避免誤入歧途。有三項基本認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本土化的提倡與學術國際化目標並不矛盾**。推動社會科學的本土化，並不是為了與歐美學術界分庭抗禮，而主要是為了維護自己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自主性，維護自身意義體系與文化認同的主體性。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的重點，並不在提倡本土社會的研究 (這只是必然的結果之一)，而是對自己知識活動從最根源處進行自覺性的反省與反思。追求學術的自主性發展，不是要孤芳自賞，更不能閉門造車；學術本土化與國際化的目標並不一定衝突；不過，社會科學本土化所設定的學術國際化的目標，不是融入國際學術分工體系，也不必然是與歐美的學術標準接軌，而是在與歐美社會科學界的平行對話中能產生知識的激盪乃至碰撞，最終達成豐富人類整體社會知識的目標。這個目標的達成要比單純追求歐美學術時尚更為艱鉅。

要達到這個境界，必然要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文化、哲學與社會根源進行挖掘，作更深層的探究，更透徹的理解，並就其局限性與偏頗性作更平衡的批判；這必然意謂着我們必須對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思維體系演變與學術傳承，以及對西方社會科學發展

與現代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及資本主義發展的緊密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⑩，以及必然要在科學哲學與知識社會學等基礎領域奠定深厚的根基；同時，必然要更有效地運用自己的文化與歷史傳承，以及本土社會發展歷程所提供的豐富素材，將其轉化為學術創作的源泉。

第二，**追求學術本土化的目標與追求知識的普遍化價值並不矛盾**。強調社會科學本土化，並不是要刻意誇大不同人類社會在文化、制度與結構上的異質性，而刻意忽視人類社會的同質性。強調社會科學知識的時空特定性，只是要打破實證主義追求普遍性通則的迷思；強調本土化並非意謂：一但社會科學的研究要充分照顧與體現單一社會的歷史特殊性時，對於研究其他時空背景下的相關議題就沒有參考價值。其實有很多學術鉅著 (例如馬克思的《路易拿破崙霧月十八日的革命》^⑪；或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既能深刻呈現特定時空下的社會結構變遷與行動者主觀意識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又具有無限的學術啟發價值。

第三，**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不是搞「學術民族主義」**。學術本土化不是要建立封閉的心靈與排他的情緒，反而應該是有助於學術觀點的多元化與包容性的成長；學術本土化不可以在各個不同層次開展，無論在更高的東亞社會層次，在華人社會的層次，以中國大陸、台灣或香港作為主體，或在以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為單元，都可以進行學術本土化的提倡與嘗試。事實上，一個原先處於結構性依賴狀態的學術社群，在從事本土化的努力與累積實踐經驗以後，反而可能對於多元觀點產生更大的包容，更可能設

學術本土化不是要建立封閉的心靈與排他的情緒。事實上，一個原先處於結構性依賴狀態的學術社群，在從事本土化的努力與累積實踐經驗以後，反而可能對於多元觀點產生更大的包容，更可能設身處地去理解與尊重不同文化本位的學術觀點。

在華人社會裏，目前只有在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已經形成一種學術運動，累積了可觀的研究動能。在香港，由於學術機構普遍強調形式上的學術國際化指標，使得學術本土化的提倡不容易得到支持。中國大陸的學術工作者面臨的首要難題，在於如何讓國家機構鬆綁對學術研究的束縛。

身處地去理解與尊重不同文化本位的學術觀點，包括中國社會內部的不同觀點，少數民族的觀點；也包括中國鄰近國家如何理解中國，以及歷史上它們與中國的關係。因此本土化的提倡應該可以提昇社會內部對話的深度，也可以提昇與其他社會對話的深度。

學術本土化的事業對於個別學術工作者的要求是很高的，首先研究者必須要主動的，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與理論取向，而不只是被動地等待自己周遭學術環境所提供的機遇與誘因；必須省思自己知識活動的實踐目的；必須深入理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哲學、文化與歷史根源；必須盡量拉長自己研究視野的歷史縱深與比較視野；必須強化自己對傳統與現代中國社會的文化詮釋能力與文字掌握能力；必須尋求與追隨值得學習的學術榜樣。

在華人社會裏，目前只有在台灣，社會科學本土化已經形成一種學術運動，累積了可觀的研究動能，特別是在社會學與心理學領域。近年來最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是《台灣研究季刊》與《本土心理學研究》這兩本學刊的創立。《台灣研究季刊》的自我定位是以台灣社會之特殊而具體的問題意識為主體，追求學術自主性為導向，以徹底挖掘問題根本並追求倫理實踐為目標之批判性文化學術刊物；《本土心理學研究》是以共同提倡與推動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之本土化研究的學術運動，以達成建立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目的。這兩本刊物在各自的領域內都發揮了引導學術研究方向與議題的作用。在香港，由於學術機構普遍強調形式上的學術國際化指標，使得學術本土化的提倡不容易在體制內得到

支持。中國大陸的學術工作者，雖然有掙脫對歐美學術界結構性依賴的自覺，但目前面臨的首要難題，在於如何讓國家機構鬆綁對學術研究的框架束縛。但突破這些制度上的障礙，還不是兩岸三地政治學者的最大挑戰，真正艱鉅的挑戰還是在於學術工作者如何突破自我心靈上的閉障與束縛。

註釋

① 在台灣社會科學界，最早的系統性討論可能是楊國樞、文崇一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對於過去二十年兩岸三地對於社會科學本土化討論的回顧，可以參考朱瑞玲：〈台灣心理學研究之本土化的回顧與展望〉，《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一期（1995）；喬健、李沛良主編：《社會科學的應用與中國現代化》（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② 對於大陸社會科學界近年來本土化運動的反省，可以參考方沂：〈社會科學如何本土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8月號。

③ 自然科學也存在研究對象與議題本土化的課題，例如醫學、生物、地質的研究，不過所涉及的主要是對象與議題的本土化問題，而社會科學所面臨的課題，不僅僅是對象與議題的本土化，而是方法、概念與理論的本土化。

④ 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⑤ 社會科學哲學領域的後實證主義學派，至少包括科學實存論、批判理論、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各派在方法論立場上的異同，可參見Ole Wæv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ed. Steve Smith, Ken Booth, and Marysia Zalewsk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9-85.

⑥ 關於科學實存論的基本主張，可參見Roy Bhaskar, *Scientific Re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Verso, 1986); William Outhwaite, *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87); Andrew Sayer,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2d ed. (London: Hutchinson, 1992).

⑦ 過去華人學者很少從這個角度切入本土化問題，黃光國對本土心理學的哲學基礎的探討，涉及到這個層次，但並非基植於「後實證主義」的論述。參見黃光國：〈比較現代性的不連續假說與建構實在論：論本土心理學的哲學基礎〉，《香港社會科學學報》，十八號（2000年冬季）。

⑧ 參見Peter Wagner and Björn Wittrock, "Analyzing Social Science: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Soci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States, Institutions, and Discours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Structur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Discourses on Society: The Shap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 Peter Wagner, Björn Wittrock and Richard Whiteley (Dordrecht: Kluwer, 1991).

⑨ 這是非常大膽的歸類，當然是對於實際現象過度的簡化，與筆者採取類似的觀點學者，可以包括註⑥Sayer；Brian Fay,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⑩ 有關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的比較可參見Philippe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iew of Politics* 36, no. 1 (January 1979): 85-131; Leo Panith, "Recent Theorizations of Corporatism: Reflections on a Grown Indust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no. 2 (June 1980): 159-87.

⑪ 可參見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 4 (1998): 687-728.

⑫ 可參見Janice Gross Stein et al.,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的專輯。特別是Janice Gross Stein, "Political Learning By Doing: Gorbachev as an Uncommitted Thinker and a Motivate Lear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 no. 2 (Spring 1994): 155-83.

⑬ 歐洲學者的多元觀點可以參見註⑥*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⑭ 學者固然要有意識的拒絕成為現存權力結構服務的工具，但這並不意味着學者必然要自命清高，完全與現存權力結構脫鉤，或始終站在其對立面。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學者要發揮轉化社會的角色，往往要與位居要津的權位擁有者打交道。

⑮ David M. Ricci, *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Scholarship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⑯ Jonathan Cohn, "Irrational Exuberance: When Did Political Science Forget About Politics?" *The New Republic* 221, no. 17 (25 October 1999).

⑰ 根據歷史記載，鄭和七下西洋所組織的龐大艦隊，至少包括兩百多艘大小船艦，其中包括四十餘艘主力船艦（即所謂寶船），每艘長125-140公尺，寬50公尺，排水量約七千噸，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木造船隻，約為一百年後哥倫布遠航用船的4.7倍。鄭和艦隊的總噸位所創下的歷史紀錄大約維持了五百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被打破。參見王志宏主編：《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台北：經典雜誌社，1999）。

⑱ 可參考Peter Manicas, *A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7).

⑲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